

彝族文学杂俎

卷之三



彝族文学杂俎

责任编辑：李昭伦
封面设计：黄启乐

彝族文学杂志

陶学良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理路38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制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10 2/9 字数：180,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184·158 定价：1.40元

序　　言

有五百多人口的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兄弟民族。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学者少有不接触彝族的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的学者少有不接触彝族的传统文化的。彝族人民在云南的历史上曾经演出过轰轰烈烈威武雄壮的活剧，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离开了彝族，我们便无法讲述云南的历史；离开了彝族的文化，我们便无法讲述云南各族的文化。

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有关彝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近年已见丰收。1984年8月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出版，把彝族历史的研究推向前进。1984年4月刘尧汉等先生的《彝族天文学史》出版，把彝族科学文化的研究推向前进。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组织专家编写的《彝族简史》预计今年年底出版；由李绍明等同志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把彝族的研究引向纵深。更不要说以彝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已有多种，部分学者在彝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上

正蕴藏着新的突破。

我们感受到一种鼓舞。但也萌生着一种等待。等待什么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看到一本以彝族文学研究为内容的著作。我想从中看到彝族的文学，看到彝族历史和彝族文学的联系，看到彝族文学如何反映着彝族社会，看到彝族社会如何影响着彝族文学。我曾经阅读过部分同志研究彝族文学的文章，也读过陶学良同志在这方面的一些专论。我准备建议学良同志把这些论文编成专集。我的建议尚未提出，学良同志已把编好的《彝族文学杂俎》放在我的面前。这实在是使人高兴。尽管《杂俎》还不算是煌煌巨制，但它却是彝族文学研究的第一本专集。开头总是困难的，开创尤其值得称道。况于洋洋洒洒之间，作者每每有独到见解给人启迪。那绝不是将就作品写文章，而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就象其中的《论九隆》、《金马碧鸡源流》、《试论彝族的创世史诗》等等，不仅民间文学工作者可以一读，就是史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也是可浏览，而且读过以后一定会感到兴趣。

民间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更不仅仅是文学。它们是与作家文学交相辉映的特殊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祖母，是培植作家文

学的沃壤。它们的特殊之点就在于：它是文，它是史，它是民族精神，它是道德规范，它是初民宇宙观的总汇，它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它要求它的研究者不要仅仅用“斗争性”、“人民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等概念去硬套它，也要求它的研究者不要仅仅把它当做搜集整理的对象而满足于发表。它其实是一门科学。要求对它进行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哲学等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尽可以沿用自己习用的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点说，《杂俎》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值得提倡的地方。

同样，“贝玛”也不仅仅是“巫师”，甚至不可以迳直把他们等同于“巫师”。他们是初民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和捍卫者，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依据历史的发展分阶段地加以评述。只有当他们完全脱离了民族的传统文化，脱离了世俗的传统职责，他们才逐渐向巫师转化，并在严格的社会分工意义上逐渐成为宗教职业者。我们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容易遭受损伤的，尤其当我们对“贝玛”类人物的批判采取不谨慎态度的时候。

好在《杂俎》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题，因而其论述足可亲近。这除了坚持科学的态度，大概还出于作者对彝族人民的深厚感情。

黄惠焜

1985年4月于昆明

目 录

金马碧鸡的源流	(1)
彝族及其它神话史诗	(11)
论九隆	(39)
寓实于玄的彝族史诗	(77)
彝族神话探索	(92)
一枝红杏出墙来	(107)
真真假假、层层相因	(115)
彝族幽默故事管见	(138)
一组彝族、纳西族、藏族讽刺故事	(155)
彝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63)
彝族古代作家、作品一瞥	(171)
《星回节》及作者	(180)
那解元	(186)
彝族学者、诗人高齋映	(197)
红旗卷起农奴戟	(225)
普飞创作的民族特色	(248)
茶花一树早桃红	(260)
彝族民歌的特点	(298)

彝族情歌漫谈	(305)
昙华山上的马樱花	(318)
彝族歌手李惠珍	(328)
彝族的贝玛及其他	(331)
后记	(361)

金马碧鸡的源流

凡是到过昆明的人，都知道昆明有一条金碧路，它是因金马坊、碧鸡坊而得名。金马坊、碧鸡坊最初建于明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争，破坏较大。近年才毁的两坊是1883年重建的。据传每年秋分那天，太阳刚出，月亮将落，日光月光恰好射进两牌坊中的一点，形成一幅刹那间的美妙景象——“金碧交辉”。这里，不但凝聚着建筑师的满腔心血，而且熔铸着金马碧鸡的美丽传说。老昆明人几乎都晓得昆明市郊还有金马山、碧鸡山、金马寺、碧鸡寺，以及东寺塔上的古迹，往往会觉得金马碧鸡的传说产生于昆明。然而查阅古书，考察古迹，事实并非如此。

一

金马碧鸡的优美传说，源远流长，最早出现于大姚、会理一带的彝族人民中，它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彝族的神奇传说。

远在西汉时，这个传说就在云南的大姚、元谋、永仁、禄劝以及四川的会理一带广泛流传。《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华阳国志》、《蜀中广记》等书都有金马碧鸡的记载。综合起来，是这样记述的：

大姚一带的禹同山上，很早就有人见过金马、碧鸡了。金马，浑身金灿灿、黄爽爽，是匹能飞善走的黄鬃神马。碧鸡，有白生生、亮闪闪的羽毛，十分耀眼。它们那斑斓的色彩，秀丽的身影，不时闪现在人们眼前。可惜的是，它们时隐时现，一晃眼就不见了。

禹同山下有一条银带般的河水，叫蜻蛉河，向北流入金沙江。金马、碧鸡就出没在这秀丽的蜻蛉河两岸。金马是匹天下难找的神马，它有日行千里的脚力，能飞跃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老百姓常把自己的马赶到山下放牧，和这匹神马交配，就能生出不同凡响的小千里骏马。

禹同山下的金马，而今还有它的足迹。那历历可数，十分清晰的马蹄印，撒满了禹同山的金马路。

这神奇的金马，可惜后来死在金沙江中了。人们为了纪念它，在四川的江原亭地方，砌了一座金马坟；在会理，则建造有天马祠。

金马碧鸡的传说产生在大姚、会理一带，是有它的历史、地理原因的。靖蛉河金沙江流域的元谋、大姚、姚安、会理、巧家等地，自古至今，二千多年，盛产名马。“滇中马”、“昭通马”、“凉山马”，秦汉时就已驰名国内。汉时，用兵西域等地，少不了良马骏驹。神马与凡马交配而生千里良驹的传说，正是这一现实的理想化的反映。那浑身金黄的骏马，无论交通运输，前方征战、生产生活，都需要它。马之于人，其功不浅，怎能不叫彝族等各族人民歌颂马、赞美马呢？人们赋予它各式各样神奇的传说，那是十分自然的。

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禹同山下，靖蛉河流域是什么民族？《史记》、《华阳国志》等所载“劳浸”、“靡莫”、“滇”等古老部落，就曾包括彝语支的先民在内，彝族的先民就曾居住在这些地区。方国瑜先生的《彝族简史》（油印本）中说：“滇池和邛都居民称为‘叟’”，又说：“东汉以后记录……叟人语言即古彝语”。这说明昆明、大姚、巧家、会理、西昌一带，居住着彝族先民。此外，在巧家附近的昭通洒鱼河古墓中，还出土一颗铜印，刻“汉叟邑长”，它有力证明，这些地区是彝族先民的住地。王宏

道、王叔武先生等的《彝族简史》（铅印、内部资料），以及尤中同志的《云南古代民族》，皆认为大姚、巧家、会理一带曾是彝族先民的住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昭通后海子出土的东晋壁画（见《文物》1963年12期）上，有“留天菩萨”、“披土黄色缀小圆圈纹披毡”、“赤足”者，西壁上就有二十七人著彝族服饰，它与今日大小凉山、昭通、楚雄的部分彝族的衣著一脉相承。在东晋壁画的南壁上，画朱雀展翅欲飞，题字“朱雀”（墨书）。细细审视，这“朱雀”之图，很可能就是民间传说的碧鸡，只不过是文人把它美称为“朱雀”罢了。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认定金马、碧鸡的传说，最早产生于大姚、巧家、会理一带，是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彝族传说，早在汉代，就广泛地流传于彝族民间了。

彝族人民把马作图腾崇拜，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彝族的先民是远古的氐羌，而古羌人曾以马、牛、狼为图腾。《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见卷八十七，2876页）牦牛羌和白马羌是从四川地区逐渐向西

南迁徙的，到秦汉之际，定居在滇东北、滇西一带。这时出现了大量金马的传说，汉以后的文人，便把它记录下来。

二

随后，金马碧鸡的传说成为书面记录，是有很大变异性的。传说产生的地点，也在不断扩大、搬家；传说的内容，有的与民间传说不尽相同。那是由于人们处在不同的地位，各从不同的角度，给以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总是起到了广为流传，扩大影响的作用。

有的历史家是从历史的角度，把金马的传说记载下来。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说：“青（靖）蛉有禺同山，俗谓金马碧鸡，其源始于宣帝时，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有的注释家也对这个传说作了记录。郦道元的《水经注》、如淳的《汉书注》都是说“金形似马”，“碧形似鸡”，“光景倏忽”，倒也生动。但也有如郭璞注释碧鸡为碧玉，他说，会理一带产碧玉。彝族人民奇妙的幻想，被他作了非常实际的解释。传说的神话色彩，传说的实质，皆被注释掉啦。

汉宣帝刘询对金马碧鸡的传说，尤为关注，终于导致民间传说实质的改变。公元前61年，刘询派遣谏议大夫王褒，来寻金马碧鸡。糊涂皇帝的糊涂臣子真的奉命来了，可惜未到大姚，就病死途中，只留下一篇有名的《碧鸡颂》。皇帝寻求神马，其用心是很深的。他想借此招抚彝族人民，归附汉廷；一则表示他对边疆神灵的尊敬，以显示他是有德之君；二则还可以找来更多的千里骏马，充实其养马场，以利征战；三则企盼得到金马之神，碧鸡之宝，供其玩娱。然而，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然而，这个传说，一经皇帝关注，更加流传开了。人们相互传颂、揣想，诗人笔下也出现了金马碧鸡的形象。如晋时，左思的《蜀都赋》里就有“金马聘光而绝影，碧鸡倏忽而曜仪”的名句。还有不少文人骚客渲染它、引用它。

三

金马碧鸡的传说，历代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晋时，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里是这样记述的：汉章帝时（公元76—88年），王阜作

益州太守，很注意倾听民间传闻，其中传说：有人看见四匹神马，常在滇池里洗澡，出没在流入滇池的河里。这四匹神马与附近民间的马交配，生出骏马良驹，成长后，一天能走五百里，甚至上千里。人们称它为“滇池驹”。

唐代，有人为金马建立祠庙，可见影响之深。樊绰的《蛮书》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

宋、元、明之际，佛教广泛传入云南，金马碧鸡的传说，又带上了宗教色彩。

明代，倪辂的《南诏野史》里讲的是：阿育王有三个儿子，他们是喜欢“其色如金”的神马。阿育王命三个儿子各自前去捕捉金马，谁捉住就是谁的。阿育王喜欢三儿子至德，私下把马笼头交给他。至德追马到离昆明不远的东山，捉住了金马，故东山叫金马山。两个哥哥见弟弟捉到了金马，只好耽在西山，山上有碧凤，当地老百姓叫碧鸡。以后，他们死了，哥哥封为碧鸡山神，弟弟封为金马山神。

清初，公元1681年，吴三桂反清，其子吴世璠盘踞云南，与清将固山贝子大战于金马山，结果清兵胜利。于是清统治者又编造一则“神话”说：清将固山贝子梦见金马腾骧，神马暗助清

兵，才打败吴世璠。他们的统治，似乎有神灵的天马协助，以致获胜。这是统治阶级利用民间传说，为自己效劳的突出例证。随着云南政治中心在昆明的确立，统治阶级利用这个传说，大作文章，借典铭功；加上文人的添油加醋，省志、县志的争相记载，金马碧鸡产生于昆明的说法，就众信不疑了。

金马碧鸡的传说，今天仍在大小凉山、金沙江两岸，以及楚雄、玉溪、曲靖地区的人民中继续流传。尽管也有变异，但始终保持着民间色彩。它与文人的记述显然是分道扬镳。如流传在大小凉山、楚雄的英雄什加尔（即支格阿龙）就曾骑着飞马，仅一顿饭的功夫，就奔走千余里，取回三根铁柱，为民除害，压住毒龙。可惜，这个后羿式的英雄什加尔，被他的等二个妻子的“好心”害死了。她为了永远地留住什加尔，就偷偷地剪了飞马的一支翅膀。于是什加尔和飞马一块掉进大海里淹死了（见《民间文学》1955年5月号）。楚雄元谋地区的《阿鲁举热》，实际上就是支格阿龙的一个变异流传本。这个古代英雄，他为人民除掉毒蛇猛兽，射下日月，造福于人民。后来他骑着飞马去寻阿妈，被土司日姆老婆，把飞马翅膀剪了三层，终于共同坠落，淹死

在大海里（见《金沙江文艺》1979年3期）。而新平、峨山的金马（飞马），它是为彝族农民起义领袖普应春服务的。普应春骑着飞马，为穷兄弟办好事。新平县的磨盘山至今还有金马的脚迹，深印在巨石上。新平县附近，还有洗飞马的洗马塘（见《新平县志》）。

金马的传说，不仅在彝族中流传，还在哈尼族、汉族中广泛传播。哈尼族有飞马的故事，汉族也给飞马增浮了很多内容，取了不少地名：元江有龙马山，新平有马龙河，通海有白马岩，玉溪有龙马山、宣威有马龙窝……多得不可胜数（参考1956年9月12日《云南日报》李孟北《龙和马》）。

金马碧鸡这则古老的彝族民间故事，对云南各族人民影响是很深的。有不少诗人、作家吸取它作为养料，并且讴歌它、赞美它。梁简文帝的神山寺铭，庾信的诗，杨升庵的《云山川考》、王蛮盛的《南诏德化碑》，近人许印芳、秦光玉、赵藩的诗……都竭力颂扬它；省志、县志也把它当作典故，几乎处处引用；对联的采用，更有奇趣；其中寺庙、学校采用尤多。如称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的“左金马，右碧鸡”、“地气宜学”，特别是